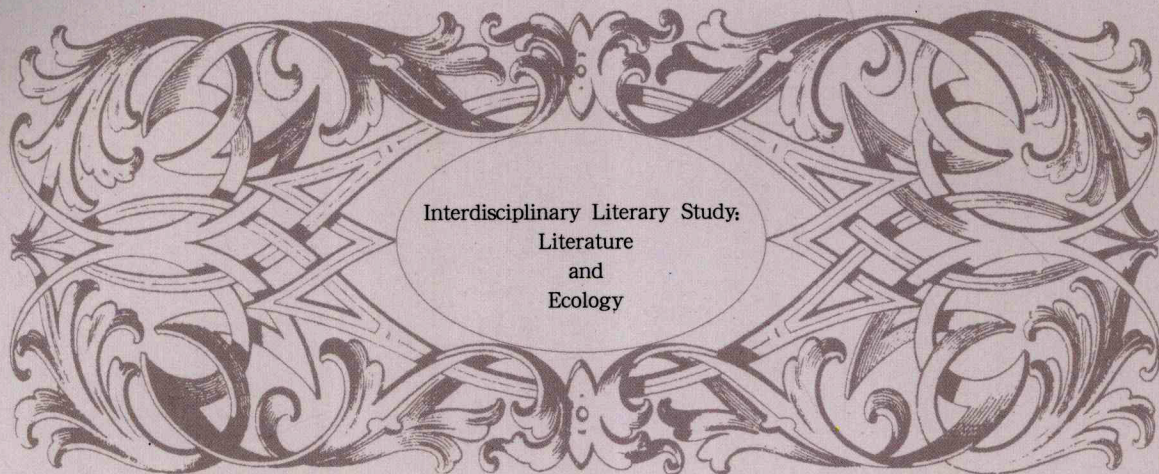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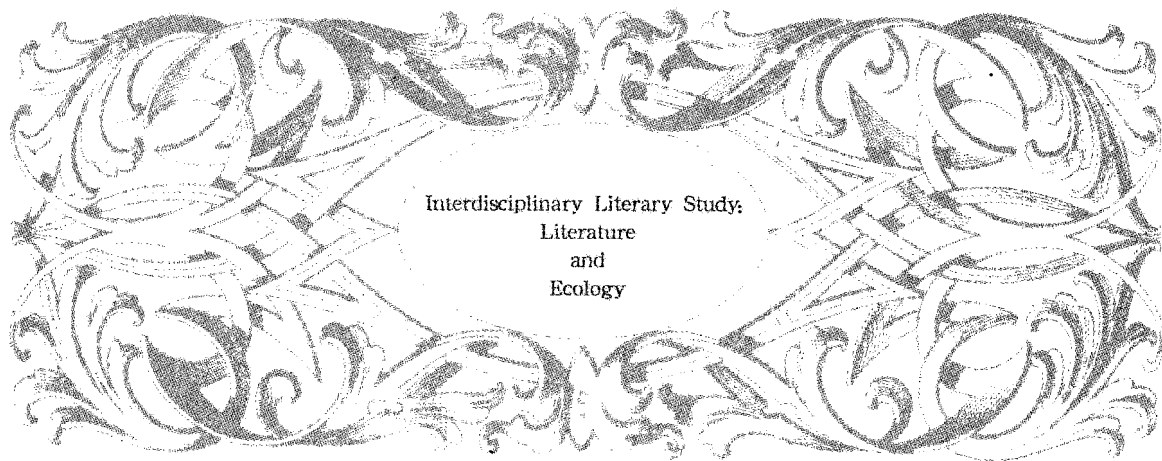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生态学

鲁枢元 著

学林出版社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y:
Literature
and
Ecology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生态学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鲁枢元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86-0080-0

I. ①文... II. ①鲁... III. ①文学:生态学—研究
IV. ①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603 号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生态学



作 者——鲁枢元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4.25
字 数——45 万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080-0/I·17
定 价——57.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南 帆

三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触动,封存已久的记忆逐渐开启了: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杂乱而又如饥似渴的阅读,火星四溅的激烈争辩与不眠的思索……当然,重温众多昔日的理论故事,人们的兴趣肯定有所转移。哪些当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视野,并且指示出另外一些思想方向?

鲁枢元先生邀请为他的三卷本学术文集作序,我的确略感意外。我的心目中,鲁枢元先生亦师亦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我们均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栏目的作者。那个时候,频繁的文学会议如同一个又一个节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岁月犹如我们共同的精神青春期。鲁枢元先生长我几岁,通常是文学会议的重点人物。他身躯魁梧而思虑缜密,观点前卫而表述谦和。这不仅是他卓然成家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兄长般的形象始终葆有特殊的魅力。90年代之后,文学急速撤离社会的精神高地。当年的文学信徒顿时如同散兵游勇,相当一部分人马逐渐为大大小小的学院收编。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与鲁枢元先生天各一方,几乎不再晤面,但是,至少在思想的舞台上,我们仍然知道彼此的方位。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首要的原因是——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交情。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主题即是文学。围绕着文学,我们相互信赖,长幼平等,不拘礼节,不论贵贱。即使目无尊长或者口出狂言,没有多少人斤斤计较。至少在我与鲁枢元先生之间,80年代的默契仍在延续——晚生后辈给文学兄长写一篇序言算不上僭越。

当然,接受鲁枢元先生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对话的愿望。我知道仍然有一些思想伙伴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四周。我们对于世界的观感如此相近,说不定哪一个时刻就会听得到同声相应。同声相应意味的是激赏、商讨、辩论、引申,这是一个思想阵营的联络方式。重读鲁枢元先生的理论文章,精神逐渐摆脱了休眠的状态,各种思考的片断开始闪动、汇聚,众多启示纷至沓来,并且渴求交流。某种发言的冲动愈来愈明晰。鲁枢元先生将这些理论文字命名为“跨界研究”——看到这个总标题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说些什么。

鲁枢元先生在一篇论文之中提到,他的“跨界研究”曾经遭受非议。一些人认为,轻率地将心理学、语言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带入文学研究,可能玷污学科的纯洁性。文学只能是文学。动不动就打开文学的门户放入一批异己,文学研究必将面目全非。显而易见,鲁枢元先生对于这种主张不以为然。在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之后,鲁枢元先生对于“跨界研究”做出了口气委婉然而信念坚定的辩护。

在我的心目中,“跨界研究”从未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决不是因为援引了哪一个学科的知识。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任何学科均有资格给予支持。一个对象隐含了许多层面。漂亮与否诉诸美学,健康与否诉诸医学,跨越不同的学科又有什么奇怪?追溯历史,人类知识的学科分类并不是来自某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某种意识形态运作,知识的分蘖与交汇,这些均可能成为学科的起源。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主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例如,现今文学研究已经与三百年前大相径庭。对于许多人再三捍卫的文学学科,“跨界研究”已经屡次发生。

相对于“跨界研究”的合法性,我宁愿关注另一个问题:“跨界研究”引入了哪一个学科,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然科学曾经大规模援助文学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风靡一时,数学与诗的关系引起了热烈的猜测。遗憾的是,这一次联合行动很快铩羽而归。面对诗意、内心的波澜、美感以及变幻莫测的遣词造句,自然科学的处理手段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这一次援助源于不无盲目的“科学”崇拜。为了清算以革命名义制造的政治神话,“科学”重新被奉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科学”赢得的社会响应如此广泛,以至于多数人无暇考虑自然科学能够在人文领域走多远。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鲁枢元先生开始提出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命题: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如此等等。这些命题很快在文艺心理学的名义之下集合起来,得到系统的阐述。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成绩斐然,众所周知;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毋宁是这种知识的奇特遭遇。

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始终是一个遭受压抑的学科。“唯心主义”的咒语时常潜伏在不远的地方,等待踏入埋伏圈的猎物。“文艺心理学”仅仅是心理学的一个微末分支,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专业术语。然而,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骤然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个科目爆发的能量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子。美,美感,幽深的内心,灵感,性格与人道主义,艺术天才,我思故我在,认识你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隐隐地与文艺心理学遥相呼应。启蒙时代正在降临,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仿佛形成了解释这个时代的理论联盟。尼采,叔本华,柏格森,马

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主义的克尔凯郭尔和萨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总之，一个庞大的队列正在更大的范围开始集结。

不久之后，问题迅速地明朗——“主体”观念隆重登场。启蒙意味了自由地启用自己的思想，“主体”必然地成为启蒙时代的宠儿。由于积极地参与主体的理论建构，文艺心理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显学”。鲁枢元先生说过，他似乎偶然地撞上了文艺心理学。然而，我宁可认为，历史仍然在冥冥之中操纵我们的学术兴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论战是一段重要的学术公案。当年的紧张气氛之中，这一场论战的思想质量令人称奇。论战之所以罕见地深入，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论战的主题涉及拥戴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美是主观的抑或客观的无非一个导火索而已。这个分歧的性质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不惮于耗费大量笔墨争辩一个是非曲直。据说李泽厚多年以后表示，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哲学问题统统演绎为“唯物”、“唯心”之争。存在另一些思考世界的入口。然而，摆脱预设的理论视域诚非易事，即使是李泽厚本人。从“主体”到“情本体”，李泽厚距离他的思想起点并不太远。

20世纪80年代，“主体”的建构以及引出的各种争议仍然在“唯物”、“唯心”的脉络上延续，只不过时常更名为“主体”、“客体”之辩。康德的思想即是从“唯心主义”的标本转换为“主体”观念的重要源头。在我看来，摆脱这个脉络的知识谱系震荡来自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语言转向”的思想展开之后，许多传统观念不得不置于另一种理论视域重新衡量。例如，如果理论不愿意正面处理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必将存在重大的缺陷。尽管如此，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语言已经成为一道重要的理论门槛。他们习惯于在以往的思想区域活动，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述的工具。能指，所指，隐喻，叙述模式，埋头推敲这些乏味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意义？历史正在出现震撼人心的巨变，各种事件的意义难道是为了塞入修辞学或者叙述学？他们对于“形式主义”的蔑视已经根深蒂固，根本没有兴趣了解“语言转向”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鲁枢元先生越过了这一道理论门槛。他勇敢地闯入新的理论视域，正式接受“语言转向”的挑战。《超越语言》可以视为应战之作。这是一部引起了强烈争议的学术著作。抛开争议涉及的种种细节，这本著作的焦点即是主体与语言的关系。鲁枢元先生充分意识到“语言转向”带来的巨大压力——他的意图是在语言沙文主义的气氛之中重申主体的权利。鲁枢元先生毫不掩饰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感。他将结构主义热衷的惯例、模式、结构、元语言形容为乏味的“鱼的骨架”。在他心目中，直觉、顿悟、神韵才是对抗这些僵死教条的心灵活动。总之，所有的争议

终将收缩到一个原点:主体与语言,谁主沉浮?主体役使语言,还是语言主宰主体?主体为语言立法,还是语言构造了主体?鲁枢元先生无疑坚定地站在主体的阵营之中。“表现论”是他恪守的前提——语言不是心灵的表现还能是什么?

这种观念显然与日常经验更为吻合。一个作家运用语言如同一个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他的天才和灵感决定了精妙的语言推敲。鲁枢元先生曾经对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做出了充分的考察。尽管如此,我仍然企图争辩的是:如果考察范围仅仅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语言能力,另一些基本的事实可能遭到了忽视。首先,语言先于主体而存在,并且构成了主体无法动摇的符号秩序。现今看来,结构主义指出的惯例、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符号秩序的强大存在——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深刻分歧在于察觉,主体无法甩下符号秩序的制约;其次,主体所认知的外部世界业已经过语言符号的编码,完全陌生因而无法纳入符号秩序的事物是不可解读的;换一句话说,这时的主体与客体均在符号秩序之内展开。愈是接近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与形形色色的符号生产愈是丰盛,这种倾向愈是明显;第三,主体不是一个不可追问的终极能指;强大的符号秩序可以塑造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主体。符号秩序是历史,是社会记忆,是文化和传统,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的主体如同未曾安装软件的计算机一样空无所有。主奴关系,他者,性别压迫与后殖民主义,这一切无不诉诸符号秩序。即使是主体最为隐秘的领域,无意识仍然受到了符号秩序的有力干预——拉康的学说玄妙地证明了这一点。结构主义之前,主体幻觉通常是一个巨大的蛊惑:某种特异的心灵往往被形容为抗拒浊世的坚强堡垒。各种意识形态如何依附于符号秩序编织在主体内部,构成各种不言而喻的文化指令,并且决定主体只能如此这般地认识世界?——如果批判的锋芒轻松地绕开这些问题,切除围绕“语言转向”的种种基本思考,主体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符号秩序和意识形态共同编成的规训机制。

对于鲁枢元先生,这一次“跨界研究”不是移师语言学。他毋宁说跨入语言领域进行一场主体保卫战。捍卫主体的必要空间,这是文学竭力争取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忽视了主体置身的坚固结构——主体会不会在浪漫主义的夸张之中膨胀为另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鲁枢元先生斥退了语言结构之后皈依了另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生态结构。这是又一次“跨界研究”的奇妙后果。

生态批评标志了鲁枢元先生的又一次思想跨越。这时,鲁枢元先生的学术性格已经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首先,不懈的跋涉显示了旺盛的思想活力;其次,所有的跨界行动均会返回一个圆心——他始终不渝地注视自己的思想主题。

为什么投身于生态批评而不是政治学、哲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鲁枢元先生仍然语焉不详。我愿意猜测,生态知识的启示和移植仅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迫

在眉睫的危机感。鲁枢元先生援引众多事例证明,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时不我待;执迷不悟或者麻木不仁,毁灭性的厄运已经为期不远——诸如此类的表述,拳拳之心清晰可见。

另一方面,主体再度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登场。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主体必须在整体结构之中谦逊地认识自己的序位。“天、地、神、人”的和谐是海德格尔们设想的秩序。然而,至少在目前,历史悠久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约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工业时代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世界。强大的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各种利器,“人定胜天”的古老理想似乎正在实现。“擅理智,役自然”,鲁枢元先生引用这六个字概括工业时代的所作所为。尽管巨额的财富滚滚而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大自然的报复必将如期而至。无论如何,自然决非单纯的掠夺对象。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观念的时候了。文学承担了改变观念的使命。相对于时髦的技术、理性、工具、概念,文学如同“开花的树”一般自然而然。文学的生气、灵魂、风骨、精神更多地带有自然的气息,更善于意识到人类必须与自然共命运。显而易见,这些历史性的判断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种种情辞恳切的吁求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隐瞒阅读这些论述的一种奇怪感觉:这些论述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尖锐。通常的意义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至于遭受强烈的理论非难——又有多少人存心把地球搅得乌烟瘴气呢?因此,如果生态批评仅仅是大声地赞美土地、河流、森林,赞美田园牧歌和清风明月,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困难程度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我想冒昧地指出的是,这种生态批评会不会缺乏足够开阔的社会历史视域?

主体的幻觉似乎仍然某种程度地盘踞于鲁枢元先生的思想。尽管鲁枢元先生广泛地描述了工业社会对于自然的掠夺性盘剥,但是,他似乎力图在主体的范畴之内解决问题。鲁枢元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古老的岔道”: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拐上了理性之途;理性不仅意味了“形而上学”,而且强调算计、解析、逻辑、控制。此后,浑然一体的诗意境界逐渐消散,强悍的工业时代显然是理性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文学或者艺术领衔演出,如果激情、美感、灵魂这些源于生命“本性”的文化主宰人类的舞台,历史或许会显示另一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总之,审美抗拒理性,主体内部的颠覆是颠覆历史的前提。

我无法判断这种观点是否一厢情愿,然而,我至少可以提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什么。首先可以争辩的是,理性和计算不是也可以论证生态平衡的思想吗?多少物质财富可以支撑一个普遍的小康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自然的综合承受力将在哪一个历史纬度上达到平衡?二者失衡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现局部乃至整体的垮塌——那个时候,全部的物质收益仍然得不偿失?总之,理性提供的数据肯定有助于设计一个合理的生态结构。另一方面,审美的意义之一是解除理性的桎梏。可

是，非理性的力比多时常溢出美学领域，成为“经济人”性格之中最富于攻击性的部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翁仍然疯狂地追逐财富。或许，繁琐地抑扬褒贬没有意义，理性或者激情均可能成为人类的强大内驱力；重要的是与哪一种历史目标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主体范畴而进入社会历史。鲁枢元先生曾经将诗意地“回归”家园视为拯救之路。但是，寄望于某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内心革命，鲁枢元先生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们的祖先曾经陶醉于如此景象。当然，还有庄子，海德格尔，托尔斯泰，还有生态学诸多前贤睿智的观点。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景象分崩离析，种种警世之言置若罔闻？显然，天翻地覆的巨变很难归咎于某个历史时刻的一念之差。我宁可认为，只有历史构造的深刻调整才能形成如此猛烈的冲击。至少在今天，如果不涉及国家、民族、经济、资本、现代性、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竞争这些炙手可热的社会历史概念，生态批评能否意识到对手的强大？

当然，鲁枢元先生对于“主体”的期待具有充分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氛围之中，这个概念在启蒙的意义上带动了社会历史。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发生的一切同时证明了问题的另一面：社会历史如何将主体牢牢地镶嵌于坚固的结构之中，限制了主体的自由程度、想象力以及可能的实践范围。

所谓的“社会历史”似乎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大词，它的结构远离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周末休闲活动。然而，可以从日常生活之中察觉这种结构的沉积物。对于主体说来，这是隐蔽的、同时又无所不在的限制。我们可以仰望星空，背诵各种宗教的美妙教义，复述哲学家高瞻远瞩的宏论；可是，回到日常生活，我们的双脚走不了多远。一箪食，一瓢饮，置身简朴的日子享受高贵的精神——强大的潮流总是把人类冲离这个轨道。无数寓言故事告知，过多的财富肯定是一种灾难；而人类哪一刻真正摆脱了利欲熏心？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颠倒：研制、维护各种军工武器的费用不仅可能超过武力征服所得，而且，某些武器隐含了毁灭一切的能量；尽管如此，哪一个国家愿意放下屠刀，铸剑为犁？所有的事实仿佛都在表明，社会历史既是一个坚固无比的结构，又是时刻可以遭遇的气息。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可以轻易击垮种种至理名言。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再三地提到社会历史的“结构”，并非有意挤压主体空间，而是揭示结构的坚固。据我所知，始终存在强调主体与强调结构两种倾向。前者重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后者重视主体的限制与边界。考察二者的角逐、博弈，我对于主体意志的评估并不乐观。现今，根本改变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要艰巨。资本的逻辑或者竞争的丛林法则从来不会把“主体”放在眼里，不论是“主体”的感人热泪、曼妙歌声还是无尽的哀思。与浪漫主义时代不同，现代主义之后只能谈论一个失意的主体。

无望地退出社会历史的结构,所有的期待俱已落空,除了低头俯视主体的内部波澜还能做些什么?当然,这时的主体不可能雄心勃勃地改变什么,独善其身而已。

然而,鲁枢元先生从未放弃主体概念。他对于内心诗意和审美的信任远远超过了我。我曾经将这种信任的来源想象为良好的文学素养、“修身”的传统和敦厚的品行。然而,重读鲁枢元先生的三卷学术文集,我意识到另一个原因:启蒙的勇气。亲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熟知这种品质。即使所有的思想努力都是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内心的火焰依然不灭。不论我们的理论观念可能存在多少差异,这一刻我再次感到,那个熟悉的鲁枢元先生近在咫尺。

2010 年 8 月 2 日

本卷说明

鲁枢元

我对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是从读 A. N. 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V. R. 贝塔朗菲的《人的系统观》两本书开始的。怀特海指出“人类的审美直觉”与“科学机械论”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审美价值更多地依赖于自然,“艺术的创造性”与“环境的新鲜性”、“灵魂的持续性”是一致的。贝塔朗菲的一句话更使我感到震撼:“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一位佛教徒偶尔说出的一句话:生态解困在心而不在物,使我又联想起海德格尔的说法: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归大地。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将自然生态、人类精神、文学艺术一并纳入我的研究视野,并尝试着将“生态”观念注入文学理论的框架,将“诗意”植入当代生态学的体系。

接下来,我才仔细翻阅了一些生态学学科方面的专著,如 P. 迪维诺的《生态学概论》,J. M. 莫兰的《环境科学导论》,H. 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及马世骏主编的《现代生态学透视》等。在持续的阅读中,梭罗、缪尔、卡森、史怀泽、利奥波德、罗尔斯顿、贝切伊、麦茜特、拉兹洛、格里芬、布伊尔、莫兰以及伯林特、斯洛维克这些国际生态批评界的先驱与著名学者开始走进我的书斋;生物圈、生物量、生态系统、生态足迹、盖娅假设、人类纪也成了我心仪的治学术语。

1995 年-2002 年,我在海南大学工作期间筹建了精神生态研究所、着手编印内部交流刊物《精神生态通讯》,并相继出版了《精神守望》、《猗猗言说》、《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等。到苏州大学后成立了生态批评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生态批评的空间》、《自然与人文》、《心中的旷野》、《走进大林莽》。即将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是我实施生态批评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我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相互沟通的一次实验。本卷收录的文字,大多出自上述著述。通过此书的编纂,我发现海德格尔、利奥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的“现象学还原”与古代中国老子、庄子、陶渊明的“回归哲学”、“回归诗学”原本是声气相投的。要弄清文学与自然在现代社会的来路与前程,就不能不摆脱现行“文学理论”的框架,“返回隐而未见的事物本身”、“返回逻辑学、伦理学诞生

之前的思的本真状态”。

有人说“生态学是一门颠覆性的学科”，我生性怯懦，缺少颠覆的英勇气概，自从关注生态批评以来，焦虑、哀伤、无助乃至绝望的心情一天甚于一天。我不能理解，在生态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与时代为何还如此放纵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近乎疯狂的蔓延扩张？在如此嚣张的房地产开发与汽车工业生产面前，一切“低碳”的宣传统统变成了“扯淡”。

伴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节节颓败，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是喧闹与斑斓掩饰下的孱弱与苍白。我所尊敬的王元化先生在临终前曾留下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个一生以激情拥抱生活的人竟怀着这样的心绪撒手人寰，活着的人又如之奈何。

如今再谈“拯救”，往往引来的只是一片嘘声。

“科技”与“管理”，曾经最受人尊崇、也被认作最强劲有力的拯救者，如今都成了有意无意的“合谋者”。剩下的只有潜隐在心灵幽深处的“憧憬”与“审美”，这也是文学与艺术的领域，且也已经遍体鳞伤。相对于坚实、强大、明朗、时尚的科技与管理，文学艺术是如此的轻柔、虚飘、幽微、苍老，所谓“文学的拯救”，恐怕只能招来更多的嘘声。然而，我们就只剩下这些了！好在还有中国古代圣哲的言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柔弱有可能胜于刚强，通体明亮毕竟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中国文学中有两位老人，多年来成了人们嘲笑奚落的对象，一位是庄子书中的“抱瓮丈人”，一位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前者抵制“科学技术”，后者怀疑“社会进步”。现在，如果用“颠覆”的目光重新审视一下，两位老人的主张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抱瓮丈人的“有机事必有机心”，似乎已经被20世纪两次高科技含量的世界大战落到实处；九斤老太“天气比以前热”、“豆子比以前硬”的哪些今不如昔的议论，在如今“地球升温”、“大豆转基因”的生态难题面前不过是轻描淡写。时过境迁，如今世间，“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通天顺地”的人，差不多全都成了昨日黄花、昨夜星辰。

我在这本书中曾经写到：1922年冬，梁启超在撰著《陶渊明》一书时，一段话中接连用了七个“自然”，来概括陶渊明的“人生观”。稍后，陈寅恪则将陶渊明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主义”。他们讲的“诗人”与“自然”关系，其实已经蕴含了“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所谓“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已经是后来事了，那里会是什么新鲜事。

目 录

序(南 帆)/1

本卷说明/1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1

地球“精神圈”与生态内源调节机制/9

人类纪:文学的使命与文艺学研究/13

相遇施贝曼

——普遍主义批判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23

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27

精神生态和生态精神

——与余谋昌先生的通信/35

余谋昌先生致鲁枢元的信/35

鲁枢元教授答余谋昌先生的信/36

精神的涵义与精神生态学/39

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46

生态批评的原则/55

《自然与人文》序/57

生态批评思想史:中西自然观的衍变/58

直线社会进步论:人类自造的神话/61

理性主义与科学技术:原来是柄双刃剑/64

生态解困:期待一场精神革命/67

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70

生态政治与生态教育/75

- 生态时代:人类文明历史的新阶段/78
- 怀特海的预见/81
- 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84
- 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90
- 托玛斯的隐喻/90
- 盖娅假说/91
- 地球诸“圈”与“精神圈”/94
- 三座“金字塔”/96
- 生存的辉煌景观/97
- 文学艺术创造的能量与动力/100
- 物理能·生物能·精神能/100
- 精神能量与创造力/102
- 想象力与乌托邦冲动/105
- 灵感迷狂与自动写作/109
- 高峰体验与变态心理/112
- 宇宙智慧·生物射线·全息隐能量场/115
- 文学欣赏中的信息交流/117
- 艺术信息的特征/118
- 艺术欣赏的场效应/122
- 体外灵思与艺术符号的生殖力/125
- 冗余信息与艺术垃圾/129
- 文学,一种恢弘的弱效应/132
- 论低物质能量的高品位生活/138
- 价值的光谱分析/139
- 低物质能量的高层次运转/141
- 艺术消费是精神的再创造/144
- 生态学与文艺学
- 与余谋昌先生的对话/148
- 百年遗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159
- 文学艺术史:生态演替的启示/166
- 元问题:人与自然
- 陶渊明与卢梭、梭罗的比较陈述/183
- 人与自然:被严重错置的“元问题”/183
- 陶渊明与卢梭:文明人向自然人的回归/186
- 陶渊明与梭罗:在诗意中营造自然与自由的梦幻/190

结语/196

陶渊明的自然哲学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关于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生态解读/198

一、陶渊明其人/199

二、陶渊明的自然哲学/201

三、陶渊明的自然哲学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203

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

——与苏州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的一场对话/211

现代都市消失了我们民族的童年和个人的童年/212

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自然的根基和自然的庇护/215

现代都市加大了贫富悬殊,更多地失去了社会公平/218

现代都市失去了亲情与同情心,失去了诗意和浪漫情调/220

现代都市让人们增长欲望却失去生存的意义/223

金融危机时刻谈生态

——鲁枢元、刘士林、路燕三人谈/227

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危机/227

人类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229

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231

结语/234

城市之忧与环境美学

——记与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一次学术交流/236

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

——兼谈消费文化、城市文化与美学的生活化转向/244

文学艺术应发挥生态警示作用/252

复杂性理论与生态哲学/254

阿凡达·荒野·山水诗/257

传媒与生态/260

学术延伸/263

别样的语境 共同的梦想

——关于两份生态批评文件的比较 韦清琦/265

复杂性理论与生态哲学 王 耘/275

生态美育视野中的“生态自我”观 徐国超/300

- 母神崇拜的生态女性批评 李红英/308
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与生态 卢志博/316
石涛“野”“逸”的精神生态启示 梅雨恬/321
中国“精神生态”研究二十年 朱鹏杰/327

附录:外界评论选摘/339

- 梁从诚:致鲁枢元的信/341 曾繁仁:新时期生态文艺学的发生/342
余谋昌:重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343 于文秀:评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344 耿占春:作为精神资源的自然和艺术/346 钱谷融:谈《精神守望》/348 曾卓:谈《精神守望》/349 张皓:一种与西方同步的文艺批评在中国兴起/349 王喜绒:谈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350 朱立元:“绿色”的奠基石/351 徐岱:生态批评的“深水作业”/352 王鸿生:憧憬人文与自然的统一/353 曹元勇:精神家园是绿色家园/354
王晓华:绘制全球生态思想版图/355 韦清琦:与 Scott Slovic 谈跨文化生态批评/357 古耜:心中的旷野朴素而美丽/358 胡志红、赵金兰: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359 徐国超: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的深层建构/362

后记/365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

贝塔郎菲(L. Von. Bertalanffy, 1901—1972)曾经如此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西方文明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周期已经结束。也还有人说,人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当前,“第三次真正的革命”正向我们走来。至于这一“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时代”的名称,人们还没有意见一致的看法,我赞同这样一种提法: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①

“生态学”(Ecology)在1869年刚由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时,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研究“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鸠”、“黄鼠狼”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动有趣则又无关宏旨的学问。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学更加引人注目,似乎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结果是建立了诸如“昆虫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湿地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一些专门化的学科。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生态学渐渐形成了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跨学科的学科规范。

到了20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有人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诞生,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学从此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杰出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1972),这是一位孤军奋战的先驱,是他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在生态学领域引进了“文化”因素,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① [美]E·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见《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